

精神堡壘

海軍軍官學校人文景物之一隅

著者／許世宗

海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中校助理教授

「精神堡壘」不僅是一種獨特藝術的載體，也隱含精神、文化、和諧等層次。海軍軍官學校「精神堡壘」是一兼具現代性與傳統性的特殊符號。它是新制「海軍軍官學校」成立後，直到遷校至廈門時，才在大門內建「精神堡壘」一座。自此，一個完整、獨立、現代化、具全國性的「海軍軍官學校」誕生了，新海軍也未再分裂或各自發展。

「精神堡壘」具備了超越地域、派系的特質，受到所有海官人的親睽。不論社會風氣如何，「精神堡壘」是海官人絕不會忘記的標竿。其上書寫的文字、外觀形貌，多次經人為干擾屢變。但其能依時空環境不同，適時調整，無形中給海官人消除矛盾，確立認同、使命感、士氣與信心。

壹、前言

當海軍艦艇在蔚藍大海航行時，白天有藍天、白雲伴遊，夜晚有明月相伴。在海上，幸運的話，偶爾還能遇到幾隻頑皮的海豚同行、灑得島上土地通紅的夕陽、圓地像一面銅鏡的滿月、無光害下滿天壯觀地星星等；甚至，還能欣賞各式漁船或貨輪之燈號，在漆黑遼闊地海平面上遊走，宛如水燈川流。若說海軍是個帶有浪漫氣質的紳士軍種，那海軍官校就是這些具浪漫特質軍官養成之培訓場。

然而，翻開民國史，民國 38 年以前，海軍的命運就如同中華民國的命運一樣詭譎，彷彿一葉小舟，在風雨飄搖中搖櫓前進。若說北伐、對日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對中華民國而言，是一場又一場地悲劇，那海軍無疑是這場悲劇中的英雄人物之一，而海軍官校正是這些時代悲劇英雄的培育場域。因此，在那個戰亂的年代，海軍無法與承平時期的我們一樣談論浪漫，他們有的只是一篇又一篇血寫的可歌可泣史蹟。

走進海軍軍官學校大門時，首先印入眼簾的是

它那以白色系為主，狀似燈塔的「精神堡壘」。「精神堡壘」不是各軍事院校所特有的，各大學、企業、政府部門等機構，都有代表其形象的標識、符號。「精神堡壘」不僅是一種獨特藝術的載體，也隱含精神、文化、和諧等層次。海軍軍官學校「精神堡壘」是一象徵符號，它之所以特別，在於其隨著時代的演變，從海軍官校符號象徵到政治符號象徵，再回到海軍官校符號象徵。海官校「精神堡壘」幾經更迭後，才呈現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樣貌—航輪兼備與航海之標誌。這點引發個人研究海官校「精神堡壘」符號記憶建構、轉向、延續之興趣與動機。

孫中山重視國防有形力量建設，也重視國防無形的精神建設，甚至認為精神建設為首。俗語說的：「一分精神一分事業。」又說：「人是宇宙的主宰。」又說：「人定勝天。」這些都充份說明精神力量的偉大。中華民國海軍建立迄今，始終都站在保國衛民的第一線，即使對日八年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要海軍謹守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之精神。這樣的精神，導致抗戰結束後，海軍軍種近乎消失殆盡。然而，海軍在先輩們不屈不撓、戮力建軍的努力下，最終建構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具備固若磐石的海軍力量。正因為如此，個人研究目的在探究，海軍軍官學校「精神堡壘」的集體符號記憶，其中所隱含之意義與重要作用，何以能促使海官人在畢業離校後，能凝聚海官人的軍種認同，堅定地扮演振興國家民族、捍

衛海疆，確保國家海洋永續發展的守護者。

貳、「精神堡壘」之符號意義與記憶

集體記憶是為群體所共用的精神內涵，是「一種物質客體、物質現實，比如一尊雕像、一座紀念碑、空間中的一個地點，又是一種象徵符號，或某種具有精神內涵義的東西、某種附著於並被強加在這種物質現實之上，為群體共用的東西。」¹ 記憶黏附於具體的事物，依附於空間、姿態、圖片和物品。² 記憶內化於符號，並在符號中為下一代所感知，同時又「以某種簡明的、象徵的方式喚起人們心中埋藏的恐懼、同情、自豪、羞愧、負罪等激情，並為群體認同和行動提供意義架構和動員的工具」。³ 「精神堡壘」是一兼具現代性與傳統性的特殊符號，傳統海軍官校文化的植入與海軍官校的精神內涵並不衝突，反而為海官人強化海軍官校象徵圖像的作用。因此，「精神堡壘」這個符號，創造海官校文化特徵，內化於集體記憶，強化海官人的認同，成為「群體所共用的東西」，為個人進入海軍官校敘事，提供想像的維度。

一、「精神」之重要性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不重視民族精神教育，也沒有一個想成大功立大業的人不注重精神修養。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精神有不可思議的力量。進一步而論，民族精神的盛衰決定一個國家民族強弱存亡的主要因素。⁴



圖1 廈門時期海官校「精神堡壘」

那麼，何謂「精神」？2004年版的《國軍軍語辭典》：「精神戰力乃無形之戰力，以人之精神力為基礎，產生於人員的心智活動，其構成要素為思想⁵、武德⁶、武藝⁷三者。」⁸又如孫中山所說：「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⁹換言之，精神力量是無窮的，不是用數字所得而計算，物質力量是有限的，卻可以用數字正確的計算出來。

歸結上述，精神是活的，是可變的，物質（武器裝備）是死的，是不可變的。精神統禦萬物，因精神由人發動（指由人賦與其根本意義），它有意志、有目的、有方向，而與精神相對的物質則無心無志，自然必受精神之支配。進一步而言，創造物質是人的精神，使用操縱物質也是人的精神。故孫中山強調「努力於文化及精神的調治，建設一大中華民族」，但願「五大民族相愛相親，

如兄如弟，以共同國家之事」。¹⁰

二、「精神堡壘」之符號意義

何謂「符號」？所謂的符號，乃是符號意義的交換中，所得到最大限度的共用，恰是建立在那些編碼者與解碼者共同記憶基礎上的象徵意義。¹¹正如霍爾（Stuart Hall）所言，符號代表或表徵我們的各種概念、觀念和感情，以使別人用與我們表現它們時候大致相同的路數來「讀出」、譯解或闡釋其意義。¹²換言之，要促成符號「行之有效」的前提是，要解碼者必須解讀出編碼者在符號中植入的符碼資訊，兩者形成意義共用空間，並實現象徵意義的互換與共享。在這個意義上，編碼者與解碼者必須處在相似的記憶背景中，擁有相同的記憶框架，才能夠意識到「彼此傳達資訊的意向」¹³，進而譯解符號的精神內涵。

因此，各大學、企業、政府部門等單位（編碼者），均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來設立「精神堡壘」，如外觀設計簡約獨特，採高大立式箱體或柱體，加上材質採不銹鋼、油漆、燈飾等材料。標識目的除了給人清新和諧的感覺外，也要有很高的能見度，使人能夠在遠距離被目視。「精神堡壘」的設計要能充分表達一個單位的形象、文化及精神，更要能給人（譯碼者）傳達一種肯定的視覺傳遞。之後，「精神堡壘」被頻繁地譯解、闡釋的象徵意義，也是記憶交匯最為貼合的區域，符號的象徵意義，往往會在頻繁的共同中趨於穩定。

綜上，記憶影響了符號的譯解和闡釋，只有在

共用了相似記憶的群體裡，負載於符號上的象徵意義才能夠在「大致相同的路數」中被「讀出」，從而保證符號傳播的有效性，形成基於符號傳播之上的政治認同或文化認同。¹⁴因此，軍隊常常會將「精神堡壘」與軍隊的關係圖像勾連起來，促使軍人在感知「精神堡壘」後，重現「精神堡壘」與軍隊之間的關係圖像。進而接受軍隊的規訓，並產生政治認同，以及強化政治合法性。換言之，「精神堡壘」這個符號的傳播與感知上，大量重現「昨日」意象，集中在海官人與「精神堡壘」之間的關係圖像，符號所指向的海軍意義與國家意義上，反而得到大範圍的傳播。

三、「精神堡壘」之符號記憶

記憶是立足於當下對過去的建構，海官校「精神堡壘」符號的建構，是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欲統攝其他地方海軍派系，構築具全國政治合法性、整合國家國防資源，所採取的必要手段。換句話說，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後，隨即決定戰前各海校¹⁵（馬尾、青島、黃埔、電雷等海校）不必復校，擬新辦一所全國性的「海軍軍官學校」，以建立一支國家新海軍。¹⁶新制「海軍軍官學校」成立後，校址幾經遷移，直至遷到廈門時，才在大門內建「精神堡壘」一座。自此，一個完整、獨立、現代化、具全國性的「海軍軍官學校」誕生了，新海軍也未再分裂或各自發展。顯然契合了大多數海軍將領對未來新海軍與國家民族發展的熱切期盼。

毫無疑問的，儘管政治權力控制下的政治化記

憶，對「精神堡壘」這個符號的建構、感知、解讀等，能產生一定的影響，但記憶本身具備流動性且龐雜，不同階段的海官人，對「精神堡壘」這個符號的記憶有著多個複雜面向。然而，集體記憶才是「精神堡壘」這個符號與海軍「自然而然」認同之間，一個關鍵性的穩定象徵。誠如民國初年，海軍的民族精神與其跌宕起伏的建軍歷程，為「精神堡壘」這個符號，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內涵。而「精神堡壘」這個符號的集體記憶之象徵意義，也深深地紮根於各個時期海軍地方派系將領心中。在這個意義上，「精神堡壘」這個符號，具備了超越地域、派系的特質，受到所有海官人的親睽。因此，「精神堡壘」這個符號的原生象徵意涵，未曾在國家的政治化記憶框架中消失，反而得到了強化。

由此可見，海官人集體記憶與政治化記憶並非不存在邊界，也並非完全一致，兩者重疊程度的大小決定了「精神堡壘」這個符號的象徵意義，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完全感知與解讀。¹⁷「精神堡壘」這個符號的象徵內涵最終得以穩定，正是海官人集體記憶在國家政治化記憶的框架下反覆地運作之結果。換言之，「精神堡壘」與海軍的記憶圖像在感知中得以反覆重現，而「精神堡壘」這個符號所象徵的內涵得到廣大的認同；反之，再次影響「精神堡壘」這個符號象徵意義的建構，最終強化了作為海軍官校象徵符號的「精神堡壘」，在不同的集體或個人間傳播。



圖2 精神堡壘背面與壘頂—「親愛精誠」字樣（民國46年前）（如左圖）

圖3 精神堡壘正面與壘頂—「航輪兼習」標誌（民國46年前）（如右圖）

參、海軍官校「精神堡壘」外觀之演變與內涵

我國自黃埔建軍以來，即以「親愛精誠」為軍風，「領袖、主義、國家、責任、榮譽」為信念，落實於「三信心」，並以「紀律嚴明」為要求，數十年來如一日，不曾改變。¹⁸直到民國89年，政黨輪替；民國95年，社會在轉型正義的口號下，興起了一股「去蔣化」運動。當時，「去蔣化」聲浪甚囂塵上，主要對象是移除具威權統治、個人崇拜、造神象徵的蔣中正銅像、紀念館（堂）、遺像、路名、機場、紀念日、教材、歌曲等。由於在兩蔣威權統治時代，國軍各個營區普遍都有樹立蔣中正銅像，海軍軍官學校亦不例外。國防部為表明對民主國家體制的尊重、軍隊效忠國家，以及避免有心人士渲染軍隊為國民黨黨軍之

疑慮，並杜絕個人或軍隊情感上過度崇拜、認同「蔣中正」這個圖騰。

是以，海軍官校為避免政治爭議事件，波及官校師生生活作息，以及校方辦學之穩定。海官校也順應時局，在其重要的人文景觀「精神堡壘」上，做了一些重大改變，如修正「永懷領袖」字樣、移除蔣中正銅像等作為。綜上，「精神堡壘」是海官人絕不會忘記的標竿，雖然，其上書寫之文字，能依時空環境不同，適時強調國家認同觀念，以及針對威脅培養尚武精神教育，無形中給海官人消除矛盾，確立認同、使命感、士氣與信心。海軍官校「精神堡壘」近70年來，多次經人為干擾，外觀形貌屢變，以下就其演變與內涵，分述如后說明：

一、廈門時期—民國38年以前

民國35年6月16日，新制的「海軍官校」¹⁹在上海高昌廟原汪偽的「中央海軍學校」舊址，正式成立。後來因為上海是個繁榮精華，充滿聲色犬馬的地區，實在不是個理想訓練之地。因此，民國36年4月1日，海軍官校校址遷往青島。然而，當海軍軍官學校北遷青島後，卻因國共內戰，國民政府的戰況險峻，北方岌岌可危。時值濟南失守，瀋陽、長春撤退，北平、天津告急，徐蚌會戰失利之際，青島三面受敵。故海軍軍官學校於民國38年2月21日，奉令南遷廈門，暫駐復華小學，環境設備、簡陋。同年9月26日廈門告急，海校再東遷臺灣島上的左營。

海軍軍官學校駐居廈門，雖然僅僅只有七個

月，卻在官校大門內建有「精神堡壘」一座，直書「海軍軍官學校」（廈門時期海官校「精神堡壘」，如圖1）。而在上海、青島期間，似乎未見此類建物。廈門時期，海校「精神堡壘」狀似炮彈（其意涵已不得而知）。有趣的是，其底座採同心圓基底，有取「同心同德」之意。其意在期望未來新制的「海軍軍官學校」畢業生，能相互扶持一條心，同心奮鬥，遇到困難能共同面對。

承上，新制「海軍軍官學校」引進美國海軍官校的4年學制與航輪兼修制度（清末海軍軍官教育萌芽之初即採英國海軍航、輪分習制度），這是海軍教育制度的一大興革。改制後的「海軍軍官學校」，將原各海校（馬尾、青島、黃埔、電雷等海校）已畢業之期別改為年班制，統稱「海軍官校」。並依同一年班，換發同一年份的畢業證書，以消弭過去海軍服役人員，因各自出身的海校不同，所造成的海軍派系隔閡。自此，海軍軍官教育學制，由原本的各海校各自發展，走向「一元」統一。從此，「四海」最終歸於「一家」²⁰，開啟了海軍的轉型契機。

二、左營時期—民國38-45年

民國38年2月21日，海軍軍官學校南遷廈門後，同年共軍南下，廈門告急，為圖長久發展之計，決定遷校至左營21（現址為日本海軍兵舍22）。民國38年9月搬遷完畢。民國38年11月21日，正期38年班學生畢業典禮，由當時東南軍政長官陳誠上將代表蔣中正來校主持，典禮後即舉行「精神堡壘」奠基儀式，未久遂即建成。

在左營遷校初期，「精神堡壘」的形式仿效廈門海校，正（南）面直書「海軍軍官學校」，背（北）面直書「親愛精誠」（精神堡壘背面與壘頂—「親愛精誠」字樣，如圖2），堡壘壘頂，係嵌置「航輪兼習」的錨和齒輪標誌，以代表海官校的教育承襲廈門時期，引進美國海軍官校4年學制的航輪兼修制度，這是尚未受干擾之前的原貌（精神堡壘正面與壘頂—「航輪兼習」標誌，如圖3）。²³

其中，新建成的「精神堡壘」狀似「燈塔」²⁴，而「燈塔」除了是國家的門面外，也常被用來做為勵志的象徵，在航海卻是用來辨識航道，提供航行安全的重要標誌。²⁵海軍官校遷校至左營後，「精神堡壘」雖然仿效廈門海校外觀，然樣式卻修正為「燈塔」。意指「精神堡壘」，精神不熄、光亮不止，是海官校的一盞「希望之燈」，期望所有海官人皆能嚴格細微地維護它永續不滅。

另外，「親愛精誠」是國軍自黃埔建軍以來，即傳承孫中山的共同校訓，就是「團結、負責、犧牲」精神，是純正負責的工作風格，領導風格是「生活不怕苦、工作不怕難、打仗不怕死」，也就是徹底奉行命令，誓死達成任務，不成功便成仁的傳統。²⁶

三、左營時期—民國45-64年

民國38年，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雖然號稱自由民主的國家，但實際上，在憲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戒嚴令的箝制下，國民黨與國軍結合成一個共生結構體，使我國政軍關係是黨內



圖 4 精神堡壘—蔣中正銅像及復興武德字樣
(民國 56 年)

有軍、軍中有黨，以及以黨領軍等特徵。²⁷ 民國 38-45 年，是國軍參與統治顯著時期。一方面，中央政府由蔣中正、陳誠及許多具有深厚軍事背景的人主導，省政府也一直由現役將領擔任主席。²⁸ 加上，海軍官校在當時爆發幾起白色恐怖事件。民國 45 年 10 月 31 日，促使海軍官校全體官師生，為表示對領袖蔣中正的效忠赤忱，利用蔣中正七秩華誕時機，特別塑造蔣中正銅像乙座，置於堡壘頂端以取代原有之「航輪兼習」標誌。民國 46 年，由當時校長宋長志少將率領全體師生舉行揭幕儀式，作為祝壽獻禮。此後，「精神堡壘」矗立校區，一進校門即可瞻仰蔣中正銅像。堡壘正面，由原先鐫文「海軍軍官學校」，後改為「復興武德」（精神堡壘—蔣中正銅像及復興武德字樣，如圖 4）。蔣中正銅像樹立頂端後，不久，又改書寫「效忠領袖」四字。²⁹

承前，「精神堡壘」上的「復興武德」字樣，仍是著重在於復興軍人的「武德」。所謂的「武」

是由「止、戈」二字合成，說明「武」的真正內涵與目標，是在預防及避免戰爭，而非發動一場戰爭。《國軍教戰總則》提到軍人武德是指：「軍人武德：智、信、仁、勇、嚴，即軍人之武德。智者：洞察是非，明辨義利。信者：誠實無欺，忠貞不移。仁者：保國衛民，捨生取義。勇者：負責知恥，崇尚氣節。嚴者：公正無私，信賞必罰。並須明禮義、知廉恥，堅定五大信念—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³⁰ 軍人以「智」，涵養全方位的專業知識；「信」守對國家與人民的忠誠；以「仁」服務官兵；「勇」於任事，「嚴」肅軍紀，充分發揚我優良傳統建軍精神。因此，「復興武德」應與時俱進，融入歷史脈動，並賦與嶄新生命，在時代的變遷下注入新時代的意義，以做為延續「軍人武德」的新價值觀。

四、左營時期—民國 64-96 年

民國 64 年 4 月 5 日，一代強人蔣中正逝世。當時的政府將蔣中正奉為民族英雄、民族救星，以及傳承堯、舜、禹、湯，乃至孫中山中華道統之繼承者，並加以大力宣揚。海官校「精神堡壘」的字樣，順應時勢，改為「永懷領袖」以資追念（精神堡壘—蔣中正銅像及永懷領袖字樣，如圖 5）。堡壘背面，始終刻校訓「親愛精誠」四字，堡壘四周，紅磚鋪地，翠柏環匝，呈現出一種莊嚴肅穆情景，令人油然而敬。³¹ 之後，軍人主政的色彩大幅消退。如民國 77 年 4 月 1 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在立法院宣布「以黨領軍」的時代已經過去。³² 民國 81 年，警總裁撤，改組為「海岸

巡防司令部」與「軍管區司令部」後，從此，軍隊不再參與統治。³³ 解嚴後，國軍角色丕變，軍隊不再是社會的控制者；隨著國內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軍隊由以往扮演執行戒嚴，國民黨軍角色，有著結構性的變化。³⁴ 然而，國民黨與國軍結構上，真正的解組，是發生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後的那幾年。

另外，自民國 79 年 7 月 1 日起，海軍軍官學校的教育幾經波折後，教育重點依「大學法」，始走向多元化，以及著重海軍艦艇的航海能力、戰略、戰術運用等（影響之後「精神堡壘」壘頂之標誌）。至此，教育方向已經不同於以往，僅著重在「航輪兼修」。誠如海軍官校將「海軍科學部」及「一般科學部」合併為「大學部」，下轄數學系、理化系、電機系、外文系、企管系、作戰組、輪機組、兵器組、體育組。民國 85 年 8 月 1 日起，配合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人力編制調整案」，大學部與社會科學部合併為一般學科部，另新成立軍事學科部（下轄戰術組、輪機組與體育組等三個組）與資訊中心。將教學單位調整為「一般學科部」、「軍事學科部」（一級學術教學單位）。民國 89 年 7 月 1 日起，奉教育部核定，一般學科部五大學系成立（電機工程學系、海洋科學系、船舶機械學系，原數理系更名為「應用科學系」、企管系更名為「資訊管理系」），並設置「通識教育中心」（一級學術教學單位），提升學生之通識素養。民國 90 年 3 月 1 日起，順應大學教育之潮流，於「一般學科

部」（一級學術教學單位）下，設立五大學系（電機、海科、應科、船機、資管），並分系招收學生。海軍軍官學校教育發展，至此氣象一新。³⁵

五、左營時期—民國 96 年 - 迄今

民國 96 年，去蔣化³⁶ 浪潮興起。同年 3 月 13-14 日，高雄市市長陳菊配合扁政府去蔣化政策，下令將高雄市蔣中正銅像拆解並移走。民國 96 年，海軍官校面臨此一社會環境，時任海官校校長王長銳將軍，為強化此一方面的對應，消彌否定軍隊、不認同的聲音，使學校的士氣、信心不受到動搖，確保學校教育之穩定。民國 96 年 6 月 14 日，王校長隨即下令拆除蔣中正銅像，並安置於軍史館中（精神堡壘上的蔣中正銅像被移置軍史館，如圖 6）。

蔣中正銅像拆除後，不久依海軍官校辦教育之特色，即走向多元化教育，兼重航海、戰略、戰術等，隨即換上代表航海標誌的錨和舵輪，原始



圖 5 精神堡壘正面—蔣中正銅像及永懷領袖字樣
(民國 64 年以後)



圖 6 精神堡壘上的蔣中正銅像被移置軍史館



圖 7 精神堡壘正面與壘頂—航海的標誌（民國 96 年以後）

圖 8 精神堡壘背面—「親愛精誠」字樣（民國 96 年以後）

輪機的標誌消失。民國 96 年 7 月，國防部將「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做為精神戰力的「五大信念」，改為「國家、責任、榮譽」三大信念，並對全軍官兵說明。³⁷ 因此，正面直書的「永懷領袖」，又再度重新改回「海軍軍官學校」（精神堡壘正面與壘頂—航海標誌，如圖 7）；背面依舊是「親愛精誠」字樣（精神堡壘背面—「親愛精誠」字樣，如圖 8）。

肆、結語

海官校「精神堡壘」作為一個被反覆塑造的象徵符號，是座兼具現代與傳統的特殊建築，長久以來，其強化了海官人的認同。成為海官人建構共同記憶的精神圖像，也是官校全體官、師、生、兵共同的精神象徵。它的位置處在整個校園的黃金分割點處，即海官校大門一進入，就可看見一個外觀獨特的圓柱體，上方有燈飾、標語、標誌等。

「精神堡壘」囊括了國家的政治化記憶與海官人群體活動的集體記憶。今年正值海軍軍官學校七十週年，新制的海官校在這 70 年的歷史中，隨著時代環境的演變，不僅褪去舊有的黨國意識形態象徵意涵，其也從單一的政治象徵（如蔣中正銅像、永懷領袖字樣等），轉換成兼具文化意涵（如錨和舵輪代表海軍的標誌等）與軍校精神象徵（如自黃埔軍校建軍以來承襲的「親愛精誠」校風）。

身為海軍官校一份子的我們，理應體認海官校先賢先烈，歷史上可歌可泣、亦悲亦壯的事蹟，與「但見一義，捨身報國」的情操。同時，獲得對「昨日」（即海官校永垂不朽歷史）的自我身份認同；進一步營造出「大我」的集體認同感。換言之，「精神堡壘」與海官校構連的記憶圖像，使集體記憶附著於「精神堡壘」這個符號上，與後代間維繫起一種共同的回憶，重現「昨日」，認同集體，展望未來。

- 1 集體記憶甚至可以通過多種多樣的藝術形式塑造和表達，許許多多以歷史為題材的影視、戲劇節目，都可以發揮這種作用。資料來源：參見 Maurice Halbwachs 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On Collective Memory)，載 Astrid Erll, 馮亞琳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335。
- 2 Pierre Nora 著，韓尚譯，〈歷史與記憶之間：記憶場〉(Zwischen Geschichte und Gedchtnis)，載 Astrid Erll, 馮亞琳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96。
- 3 汪舒明，《大屠殺記憶與美國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 年)，頁 38。
- 4 高殿均，《精神教育甘講》(臺北：帕米爾書店，1958 年)，頁 1。
- 5 思想：是精神戰力之源，在於建立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堅定五大信念及認清為何而戰、為誰而戰，以陶鑄大愛大恨、無私無畏的意志力。資料來源：參見國防大學軍事學院修編，《國軍軍語辭典(九十二年修訂本)》(臺北：國防部，2004 年)，頁 3-4。
- 6 武德：智、信、仁、勇、嚴為軍人的武德，是軍人應具之哲學修養與基本德性。資料來源：參見國防大學軍事學院修編，前揭書，頁 3-4。
- 7 武藝：卓越之指揮才能與精湛之戰鬥技能謂之武藝；其構成要素為智慧、學術與體能，是精良軍隊的必備條件。資料來源：參見國防大學軍事學院修編，前揭書，頁 3-4。
- 8 國防大學軍事學院修編，《國軍軍語辭典(九十二年修訂本)》(臺北：國防部，2004 年)，頁 3-4。
- 9 孫中山，〈軍人精神教育〉，《國父全集(第二冊)》(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 年 6 月)，頁 284-285。
- 10 黎心竹，〈民族認同話語下的孫中山符號記憶〉，《紀念孫中山 150 歲誕辰兩岸四地孫學研究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16 年 9 月 17 日)，頁 135。
- 11 同註 10，頁 140。
- 12 Stuart Hall 著，徐亮、陸興華譯，《表徵：文化表徵與意指實踐》(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頁 7。
- 13 李岩，《傳播與文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7。
- 14 同註 10，頁 141。
- 15 中華民國建立初期，有閩系、粵系、青島系、電雷系等四支主要的海軍，他們有自己的學校，分別為馬尾(中央海軍)、黃埔(廣東海軍)、青島(東北海軍)、電雷等四間海校。此外，早年還有吳淞、江南、煙台、天津、昆明湖等水師學堂。這四支主要海軍，也有自己獨立的任官體系與典章制度，彼此征戰與互挖牆角，如同地方軍閥一樣。八年對日抗戰，海軍派系問題在戰爭中被破壞。戰後重建時，蔣中正為避免海軍派系，再次造成分裂，他首先統一海軍官校開始做起。因此，新制的海軍軍官學校就此成立。資料來源：參見〈四海一家〉，《中國軍艦史月刊》，第 13 期，2011 年 1 月，〈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70/70-index8.html〉(檢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 日)。
- 16 國民政府成立後，即形成統一各軍事教育的政策。民國 17 年(1928) 8 月，國民黨第二屆第 5 次會議通過決議，各軍各地方不得自設軍官學校及類似軍官教育之學校，軍事教育歸中央統一辦理。故抗戰勝利後，各海校並沒有復校之舉，而是成立一所直屬中央的「海軍軍官學校」。
- 17 同註 10，頁 141。
- 18 王秉宏，〈我國軍人社會地位的演變與策進之道〉，蘇進強等著，《軍隊與社會》(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 年)，頁 163。
- 19 新制「海軍軍官學校」成立後，校址幾經遷移：上海(35 年 6 月)→青島(36 年 4 月)→廈門(38 年 2 月)→左營(38 年 9 月)。
- 20 「四海」指閩系、粵系、青島系、電雷系，彼此互有派系隔閡，自新制「海軍軍官學校」成立後，則歸於「一家」，沒有出身不同的派系之爭，而是國家的新海軍，具有堅定而一致的信仰。
- 21 迄民國 38 年大陸易幟前夕，正式將整個海軍編制搬遷到臺灣島，包括海軍總司令部、海軍艦隊、海軍陸戰隊、軍區、修造機構、供應機構以及教育機構等，除海軍總司令部設於臺北外，部隊及機構設施大多集中於左營，顯示左營的重要性。這些機構設施，包括修造機構、訓練機構及海軍總醫院在內，許多均倚賴日人所留下的房舍設備，再加以修繕或重建。
- 22 左營造船所即以日本海軍的左營修艦部為基礎，負責海軍人才養成的訓練機構，如海軍學校、海軍機械學校、海軍士兵學校，所需的教室，初期亦是使用日遺房舍。
- 23 海軍軍官學校校史編撰委員會，吳守成主編，《海軍軍官學校校史》(高雄：海軍軍官學校，1997 年 10 月 17 日)，頁 735-736。
- 24 「燈塔」自古以來便是海上船舶重要的導航設備，儘管現代船隻都已具備衛星導航，但「燈塔」的地位仍是無可取代。天候不佳會嚴重干擾無線電或衛星導航設備，閃爍的「燈塔」成了唯一的警示地標，是航海人心中的汪洋明燈。
- 25 〈海軍建築〉，《中國軍艦史月刊》，第 24 期，2011 年 12 月，〈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81/81-index5.html〉(檢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 日)。
- 26 郝柏村，〈「蔣公與黃埔」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近代中國》(臺北市)，第 157 期，中國國民黨，2004 年 6 月 16 日，頁 151。
- 27 鄭曉時，〈我國政軍關係的變遷趨勢：1987-1995〉，蘇進強等著，《軍隊與社會》(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 年)，頁 88。
- 28 同註 27，頁 89。
- 29 同註 23，頁 735-736。
- 30 丁錫光，〈國軍教戰總則〉，《中華百科全》，〈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_media/main-soc.asp?id=6092〉(檢索日期：2017 年 4 月 21 日)。
- 31 同註 23，頁 735-736。
- 32 同註 27，頁 89。
- 33 同註 27，頁 89。
- 34 蘇進強，〈國軍與社會關係之建構〉，蘇進強等著，《軍隊與社會》(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 年)，頁 49。
- 35 〈海軍官校沿革及教育演進如何?〉，《海軍軍官學校網》，〈http://www.cna.edu.tw/tw/Service.php?proglid=SER008&clazid=SER008&cms=cms_906〉(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9 日)。
- 36 「去蔣化」運動主要針對蔣中正，原因在於蔣中正主政時，對人民壓制情況相較於蔣經國時期苛刻。加上蔣經國去世後，政府幾乎沒有在公共場合建立關於蔣經國的象徵物，因此去蔣化主要是針對蔣中正進行。
- 37 許紹軒，〈李規李隨 國軍五大信念仍將減二〉，《自由時報》，2007 年 5 月 25 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2120〉(檢索日期：2017 年 4 月 21 日)。